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4.05.00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 历史—文化语境分析

——兼论爱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汇合

高欢欢, 汪庆玲

(中共宣城市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教研室, 安徽 宣城 242000)

摘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今天的结合既非硬凑, 也非“拼盘”, 更不是概念、范畴的简单复制。从二者结合前的历史语境看, 19世纪后半叶开始, “合取”思潮的渐行与“两种文明”的式微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打开方便之门。从二者结合前的文化语境看, 中国民众对传统文化的失望与期望、对现代化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向往与反思, 这两种矛盾心理的弥合为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文化提供文化机缘。由此, 马克思主义作为诞生于西方又批判反思西方资本主义的学说, 既解答了中华民族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质疑, 又弥合了中国民众要拯救民族传统、实现民族独立富强, 又不能以资本主义方式进行实现的两重心理意愿。其拯救民族方式上的特殊要求预示了爱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历史必然。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合取”思潮; 历史语境; 文化语境

中图分类号: A811; G1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4)05-0029-08

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Analysis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Historical Convergence of Patriotism and Marxism

GAO Huanhuan, WANG Qingling

(Xuancheng Communist Party School, Department of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Xuancheng 242000, 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day is neither a forced fit nor a patchwork, nor is it a simple replication of concepts and categories. From the historical context before their integration, the gradual emergence of the conjunctive trend and the decline of “two civilization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paved the way for the combi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ultural context before the combination, the reconciliation of the two contradictory states—the Chinese people’s disappointment and expect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ir yearning and reflection on modernization

收稿日期: 2024-04-20

基金项目: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系统重点项目“深刻领悟‘两个结合’的精神实质”(QS2023078)

作者简介: 高欢欢, 女, 安徽宣城人, 中共宣城市委党校讲师,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

and Western capitalist modernization, provide cultural opportunities for Marxism to integrate into Chinese culture. As a result, Marxism, which was born in the West and criticizes and reflects on the theories of Western capitalism, has not only answered the Chinese nation's doubts about Western capitalism, but also reconciled the dual psychological wishes of the Chinese people to save the national traditions and achieve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prosperity without adopting a capitalist approach. The special requirement on the way of national salvation foreshadows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combining patriotism and Marxism.

Keywords: Marxism;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onjunctive” thought; historical context; cultural context

一定的历史发展之势蕴含推动历史发展之理,历史发展之理无不是对具体历史事件的理论反思^[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一种哲学高度、价值理念、思想精髓等方面的贯通与融合,不能简单地找寻二者在概念、语词上的雷同和作结合上的拼凑功夫。二者的交流、碰撞、会通、融合既是顺应历史发展之势,也是对一连串具体历史事件的理论反思。基于此,本文拟深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联系、发生结合的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梳理二者在当时情况下能够融合的深层动因,揭示爱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产生结合的历史必然。

一、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研究的两种倾向及其弊端

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明确“第二个结合”的要求,即“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2]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明确“第二个结合”不是硬凑,不是“拼盘”,二者价值主张高度契合,这是二者有机结合的前提,并且“结合”以后将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可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第二个结合”是价值观念层面的融通,是哲学高度、精神的层面的结合,而非简单的语词复制或概念的套用。有一种结合将孔孟老庄和马克思恩格斯说过的雷同话语拿过来合在一起,还有一种结合用传统文化的一切方面进行结合,均不是总书记所强调的深层次的价值观念上的融通。

随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第二个结合”的命题,

学术界关于二者结合问题的研究高潮不断,从学理上分析二者结合问题全面展开。围绕“第二个结合”命题,学术界在理论阐释中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另一种是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概念、范畴去解读马克思主义学说^{[3][28]}。这两种研究倾向的一个共同缺陷是都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置于一种外在的对立关系中去把握,缺乏从具体的实际联系、实践的展开中去分析。第一种研究倾向,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为少数先进知识分子所选择改造主观世界过程中发挥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某些保守性的改造作用,这种改造虽然以思想-理论形式呈现出来,但其实际展开则是基于革命与变革的实际需要。第二种研究倾向则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成为现实的既定事实,反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两种学说在理论上存在的“共通之处”并竭力去寻找这些“共通之处”,以期在理论、文化层面找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必然结合的根据。这种倾向直到今天依然得到众多学者的高度认同,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不少知识分子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相联系、相比附”,“中国人之所以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的共同之处”^[4]。此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基于既定历史事实确定马克思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主张上存在高度契合性本身并非学术创见,那么建立在此基础上去寻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在抽象概念中存在“兴奋点”的研究倾向,重复一些抽象性原则就显得不够严谨、慎重。

实际上,当回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最初展开对话的历史-文化语境可以发现,二者的最初接触并不存在一个理论自觉时期,中国民众并非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一番分析、论证、研究工作而后发现二者存在高度契合,再去进行结合实践^{[3]285}。而是相反,实践的开启要早于理论上、文化上的分析研究^{[5]3}。更进一步讲,即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理论上存在契合性、思想上有共通之处,也不一定必然构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际接触的内在理由。五四运动以前很长一段时期,合取中西文化之长以拯救濒临危亡的中华民族是西方许多思想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展开与中国传统文化对话的共有的历史背景。五四运动前后的那段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突出的历史-文化视域是中国民众、有识之士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失去信心、在“打倒孔家店”这一激进的反传统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开始的^[6]。“当时国人对中国古典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感到双重失望,从而寻求‘第三种文明’。”^{[5]57}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视域下,中国民众对资本主义的质疑、拒斥心理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反思性在认识上的一致性拉近了二者的距离,增进了二者间的亲和性。加之外敌入侵,中华民族内部爆发出的强烈的爱国主义诉求与马克思主义作为“第三种文明”身份可能满足这种诉求实现历史汇合构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初结合的重要思想前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创造了条件。撇开具体的实践要求、历史视域、文化语境,从抽象概念上谈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无异于舍本逐末。早在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大地的深度原因“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以及“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7]是融通的。无论是时间向度,还是实践要求,二者融通都是深层次的,不仅仅是几条抽象性原则、概念的时代重复。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开对话的历史语境

在19世纪后半叶,“合取”思潮的渐行及“两

种文明”的式微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展开对话打开方便之门。中国民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失望以及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反思质疑,为诞生于西方又反思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提供历史契机、文化机缘。“人们在学习、借鉴和吸收西方的文化养料的时候,会经常不断地回思、反省中国固有的文化资源。那些以救国为己任的志士们还会时时关照当下的国情民俗,力求有所会通。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新的文化隐隐发生了。”^{[8]162}

(一)“合取”思潮的渐行

19世纪后半叶,中华民族整体性地陷入内外交困的历史境地,中华民族文化也面临生存的危险。李鸿章将中华民族遭遇的历史性磨难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9]。马克思曾预言,古老帝国盲目沉迷于“天朝上国”的自我夸饰和人为地与世隔绝,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10]。为了挽救濒临危亡的中华民族,从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洋务派开始踏上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他们试图合取中西文化之长以拯救国危。1861年,冯桂芬写成《校邠庐抗议》承接魏源“师夷长技”思想而有所前进,提出“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11]135}这一具有强烈冲击的时代之问和“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1]156}的重要见解,成为叩开那一时代合取中西文化之长挽救民族颓危之势的思想之门。1902年梁启超曾断言,20世纪是泰西文明与中华文明“结婚之时代”,“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12]。其合取中西文化以济弱扶危的意图十分明显。这种思想既“要求本土精神文化的优越性,又主张为了进步要尽可能有选择地借鉴西方的物质文化。这种东西方优越性相结合的结果既为这些‘落后’民族提供西方掌握自然的设备,又使他们可以高度保持自己的精神性(文化、斯拉夫灵魂等)”^{[13]11}。要西方先进物质技术的同时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构成“合取”思潮的一般观点。1920年罗素对中国进行一番考察以后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作者在书中直言“让他们从西方文明中吸收想要的东西,拒绝不好的东西,他们就有能力从自己的传统中获得有机生长,综合中西文明之功,取得辉煌成就”^{[14]10}。可见,19世纪后半叶乃至20世纪初,“合取”思潮被传

统士大夫及一众现代知识分子视为扭转中华时局的重要思想。这种思想为同样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展开与中国实际接触、与中国传统文化对话打开了思想阀门。

(二) “两种文明”的式微与对“第三文明”的呼唤

“合取”思潮渐行本身就是传统文化在实用层面式微的一种症候,“‘中国的精神同西方技术相结合’这种陈腐思想的千万种形式都来源于那种对精神和文化灭绝的恐惧”^{[13]11}。到20世纪初,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大规模踏上全面学习西方现代文化历程;五四运动之前,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一直在激烈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与全面学习西方现代文化的张力结构中前行。其时,传统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劫难,不断式微。然而,一战后,中国进步人士及先进知识分子终结了效法西方的美梦,在大声疾呼欧洲文明破产的同时,一些先觉者由此开始谋划近代征程的新起点,呼唤“第三文明”的出场。

第一,传统文化的式微由儒学式微波及民族传统的一切方面。20世纪初,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大规模踏上全面学习西方文化模式的历程“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怀疑与动摇”^[15]。一方面,清王朝的覆灭使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文化的价值和功能宣告破产。“‘孔教’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16]“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17]对于阻碍新社会新国家和新信仰的孔教必须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非除之不能迎新。在当时,孔教与封建主义是同义语,欲除封建主义,必须除掉作为封建主义画符的孔教。艾思奇指出:“中国的社会的封建底幻梦是被资本帝国主义的大炮冲破了的。中国的文化的封建底幻梦也是在帝国主义的洋枪的威力之下逼倒了台。”^[18]到五四运动之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激烈批判儒家文化、封建主义与全面学习西方现代文化张力结构中艰难前行。当时的知识分子“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机械地对立起来,表现为在某些问题上否定中国的一切而肯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做法,忽视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的特殊性”^{[19]77}。另一方面,对儒学的批判发展为对民族传统一切方面的批判。山本新等人在《未来属于中国——

汤因比的中国观》一书中说:“从胡适的白话(口语)运动开始的儒学批判,甚至发展到对其根基孔子本人进行批判,还波及作为中国基础的家族制度即宗族制度。凡是阻挠中国近代化的传统的权威、制度和思想都要予以淘汰。”^{[20]29}儒学的式微演变为一切传统文化的整体性式微,但这种情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文明缺陷暴露出来以后发生新的变化。

第二,资本主义文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遭遇重创,开始受到中国民众的质疑与反思。柳诒徵曾说“欧战以后,世界思潮,回皇无主,吾国学者,亦因之而靡所折衷,不但不嫌于中国旧有之思想制度,亦复不满于近世欧、美各国思想制度。”^[21]还说,中国极端改革派做法与俄国相近。1920年,梁启超在游欧回国后曾多次断言西洋文明已经破产,“文明灭绝的时候快到了”^{[22]725}“中国效法此种病态,故不能成功”^{[22]738}。早在1917年,毛泽东曾明确表示“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23]29}。1920年,他又进一步表示除北冰洋的俄罗斯,全世界、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24],并准备创办文化书社宣传新思想、新文化。1918年李大钊在《新的!旧的!》一文中就呼吁一种超越西方现代文明又能够包容、负载中国传统政治、信仰、习俗的新文明。“新的气力太薄,不能努力创造新生活,以征服旧的过处了。”^{[25]291}针对中国出现的新的民国、宪法、政治、法制等对旧的传统、信仰、习俗等等的无力驾驭的现象,李大钊呼吁新时代的青年“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25]291-292},既能包容过去,又能继续进步。之后,又旗帜鲜明提出非有第三新文明不能出世界危机^{[25]311}。在中国文明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外对“第三文明”的呼唤,为诞生于西方又迥异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出场提供了历史契机和文化机缘。正是“当近代文明发展走前一步的欧洲陷入空前浩劫之时,中国却因反思清末以来为追求近代文明而相继进行的革命与改革累次遭遇失败而产生新的觉醒,先觉者开始构建近代征程的新起点”^{[26]184}。可以说,外在的历史大势已经准备就绪,但要使历史大势呼出指导现实之理,还需要相应的“人事”予以协同配合。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前的文化语境

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民众对资本主义的反思、拒斥心理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反思性认识上的一致性增进了二者的亲和性与进一步对话的可能性,弥合了中国民众接纳现代性与反思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矛盾心理;另一方面,中国民众心中潜藏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拯救情结要借助于西方但又不能借助西方资本主义才能实现的矛盾心理,只能在来自西方又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兼顾,弥合了中国民众对传统文化的失望与拯救、要现代文明又不要殖民、霸权性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矛盾心理。两种矛盾心理的弥合从理论、文化和心理层面助推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文化。

(一) 接纳现代性与反思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矛盾心理的弥合

中国人民要现代化,但不要殖民性、霸权性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中国要快速变化,但在西方拥有强大军事、经济实力可能构成的威胁前,综合中西文明之功就要防止两种危险,一种是完全西化,“虽懂知识、有工业实力,但焦躁不安、穷兵黩武的国家”,一种是“心态保守,强烈排外,只注重武装备战”^{[14]10}。所以,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期望找到一种可以“使中国人能避免西方道路上隐藏着的陷阱,但它同时却可以使中国人从西方文化中得到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13]118}。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批判、反思资本主义形式以及实现全世界被压迫、被奴役民族实现自身解放而斗争的学说,解答了中国民众对资本主义的反思与质疑,二者对资本主义批判反思性认识上的一致性,无形中增进了二者间的亲和性,为进一步对话和接触创设了可能。在中国本土,先进知识分子之所以受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影响,“是因为这种思想提供了一种发展工业的办法,可以绕过私有资本主义发展阶段”^{[14]197}。私有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弊端为先进知识分子所批判和反思:“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备受资本主义列强掠夺压迫之苦。即使那些勉力向资本主义各国学习的人,其中之多数,未尝没有对资本主义列强反感的心理。”“只是他们对这个西方来的怪物始终

缺乏本质的认识。马克思学说以无比强大的逻辑力量,使人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压榨和掠夺的本质。它受到人们的赏识和欢迎,实是理有固然。”^{[8]316-317}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下具备融入中国文化的理论必然性。

(二) 对民族文化及自身传统失望与期望的矛盾心理的弥合

这种矛盾心理既有对本土文化及自身传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绪,又有拯救情结与诉求,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当时“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带有双重性,即一方面对本土文化及其传统失望,另一方面又有拯救情结”^{[5]73}。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必然导向对民族兴盛的无比向往、期待和践履。山本新等人明确“中国过去所蒙受的屈辱,使当今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20]51}。因而,一众知识分子将“重新唤起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信心,从而振奋民族精神,拯救中华民族”作为自己的使命^[27]。但是,由于“北洋政府推行文化复古主义,使封建主义思想沉渣泛起”^{[19]71}。又由于对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劣行等等问题的交织,使得该怎样突破封建主义而保存传统文化精华又“吸纳外来文明实现民族文化的新生……成为追求制度革新与国家富强的人们不得不严肃考虑的重大问题”^[28]。要民族文化精华,又不要封建主义糟粕;要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又不要霸权性、殖民性的西方文化,这种矛盾心理的又一个表达就是需要吸收外来文化拯救民族传统,但是这种外来文化必须同时兼具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反思。“一方面是纯粹西方的,另一方面是反对西方的;一方面满足了中国知识分子认为救中国的意识形态必须来自西方,另一方面又满足了知识分子一定要打倒帝国主义、列强,发扬民族精神的愿望。”^{[29]286}能够同时满足这两种意愿的学说,在当时只有马克思主义一家。“马克思主义则能够兼顾这两个方面,很好地满足或契合当时中国人的这种文化心理需求。”^{[5]73}更进一步讲,“在当时中国的学术氛围中,意识形态要来自西方,这是全盘西化和反传统所要求的。同时,这个意识形态一定要和强烈的爱国主义,也就是反帝国主义、反侵略的悲愤之情结合起来”^{[29]318-319}。所以俄国革命在西方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之外使先进的中国人看到一种全新的

思想理论和社会理想^{[19]71}。总之,两种矛盾心理及意愿的弥合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文化的历史必然,揭开爱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序幕。

四、爱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历史汇合

意识形态来自西方,但又必须与反帝、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情结结合起来,其必然导向爱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汇合。实际上,爱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存在显著差异,二者并不存在结合的必然性,但二者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的结合却是事实。爱国主义是“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思想基础和思想前提,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也迎来了变革与升华。

(一) 爱国主义同社会主义远大目标的结合

1920年冬至1921年,中国思想界展开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改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社会道路问题存在不同主张。改良主义者张东荪、梁启超等以中国国情特殊为由,认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经由资本主义道路,发展实业,发达经济,反对走俄国道路^{[19]110}。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针锋相对批驳了张、梁等人的观点,称他们是存心想主张资本主义而不敢明目张胆主张资本主义的儒人,不然就是自欺欺人的伪善者^{[19]111}。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中国只能走俄国人的道路^{[30]527},与其“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还不如用社会主义为宜。”“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31]353-354}在军阀、土匪横行、外国掠夺形势下,想以资本主义来开发实业,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32]47}。总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通过这次论战,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分子所认同、接受,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诞生后,即把“建立工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33]133}。他们播下革命的种子,为“共产花开”,不怕“壮烈的死”,不惜用鲜血来浇灌^{[33]55}。爱国主义由此达到了新的境界。

(二) 爱国主义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策略的结合

一是将爱国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方式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建前夕,社会主义同无政府主义就以什么

样的手段实现共产主义展开论争。无政府主义宣称:“人的本性善良,只须普遍的教育、感化即可。”“国家、政府,自来就是要不得的东西,是保护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工具,应当彻底消灭掉。”^{[26]446}对此,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反驳:“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的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23]74}在中国“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23]80}。总之,只有进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才能完成革命,建立共产主义。这次论争升华了中国进步青年爱国报国方式,使他们进一步认清了科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的区别,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并迅速投入到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工人群众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中。

二是将爱国主义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对象结合起来,认清中国革命的具体进程。五四运动本身是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只是运动的参加者们并不清楚这是中国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经过“五四”洗礼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经列宁、共产国际的启发、帮助以及自己探索,很快认识到中国革命首先必须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紧接着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共二大明确中国共产党“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消除内乱,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等的民主革命纲领^{[30]133}。从此,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人民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这意味着爱国主义同人民大革命以及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结合了起来,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征讨北洋军阀、开展土地革命、抗击日本帝侵略者、打倒美蒋反动派等一场场伟大革命运动的内涵与意义得到丰富与升华,其既是爱国主义斗争,也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使爱国主义传统得到充实、巩固和发展,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以正确的主张、方式表明自己是历史上最先进最科学最伟大的爱国政治力量,实现了百多年来爱国志士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并最终促使爱国主义结出伟大果实^{[32]48}。

(三) 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的结合

国际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它主张全世界无产阶级,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要相互支持才能取得世界革命胜利^{[34]659}。近代中国是一个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殖民地国家,民族革命的目标之一是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这一目标同侵略中国的那些国家中的无产阶级以及与中国遭受同样命运的被压迫民族的斗争目标是一致的。所以,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实际上具有天然的国际主义性质,只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前,没有哪个中国人认识到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近代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升华,开始与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结合起来。

李大钊最早觉悟到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问题,针对日本侵略分子为了吞并中国、称霸亚洲而鼓吹的“大亚细亚主义”,他提出并反复申述了“新亚细亚主义”的主张。“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该解放”“结成一个大连合”“共同完成世界的联邦”^{[25]381}增进人类幸福。李大钊不仅把五四运动看作是中国人的“爱国运动”,而且认为这个运动“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31]88}。他号召,中国青年应与全亚细亚青年联成大同盟,朝着扫除“日本的军国主义、资本的侵略主义”进而塑造一个光明的世界的“同一的方向”奋进^{[31]229-231}。李大钊的观点无疑体现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结合,为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注入了争取全亚洲乃至全世界人民解放的国际主义精神。

毛泽东也是较早觉悟到爱国主义必须与国际主义结合的进步青年之一,并且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贯穿于领导中国革命、建设事业始终。1921年1月新民学会大会确定学会宗旨为“改造中国与世界”,那时毛泽东就明确,“从事中国改造若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23]77}。这是毛泽东立志通过俄式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的较早表达。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贯穿毛泽东有关中国革命、建设事业始终。1935年,毛泽东指出:“全世界一切由人民起来反对压迫者的战争,都是义战”“我们的抗日战

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休戚相关的。”^[35]1938年,他又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34]520}中国革命乃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胜了、帝国主义被打倒了,就是对压迫奴役外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力量的削弱。1957年毛泽东出访苏联时发表重要讲话,再次重申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结合,强调在胜利前进的时候,要谨记保护并增强社会主义各国、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36]。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地争取解放的斗争及其胜利,不仅本身构成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且直接推动、鼓舞了世界无产阶级尤其是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民主革命斗争也完整地体现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结合。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它的那个时代。我们不能抽象地、孤立地谈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这样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也有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圣之时者”的运思方式和推崇“践履”的实践品格。从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考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化优秀传统文化展开对话以及最初结合的深层动因,可以看到二者的结合不仅有深刻的思想根源即理论上的契合与贯通,还有深刻的情感、理智、实践要求等等多方面综合要素的推动。在今天,我们要自觉从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高度去把握“第二个结合”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推动二者在新的时代紧密结合起来,助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发展。

参考文献:

- [1] 戴兆国. 势·理·事: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由之路 [J]. 哲学研究, 2010(5): 17-22.
-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17.
- [3] 祝和军. 当马克思遇见新时代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
- [4] 洪晓楠.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系统分析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3(10): 4-15.

- [5] 何中华. 马克思与孔夫子: 一个历史的相遇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
- [6] 何中华.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何以可能? [J]. 文史哲, 2018(2): 5-30.
- [7]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278.
- [8] 耿云志. 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 [9] 中国史学会. 洋务运动: 第1卷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 312.
-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632.
- [11] 冯桂芬. 校邠庐抗议 [M].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17.
- [12] 方志钦, 刘斯奋. 梁启超诗文集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3: 355.
- [13] 艾恺. 最后的儒家: 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 [M]. 王宗昱, 冀建中, 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8.
- [14] 伯兰特·罗素. 中国问题 [M]. 田瑞雪, 译.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9.
- [15] 方松华, 陈祥勤, 姜佑福. 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术史纲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1: 4.
- [16] 陈独秀. 陈独秀文章选编: 上卷 [M].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144.
- [17]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423.
- [18] 艾思奇. 艾思奇全书: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37.
- [19] 顾海良, 丁俊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第一卷·1919—1949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 [20] 山本新. 未来属于中国: 汤因比的中国观 [M]. 吴栓友, 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8.
- [21] 柳诒徵. 中国文化史: 下卷 [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6: 1134.
- [22] 李华兴, 吴嘉勋. 梁启超选集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上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传(1893-1949)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65.
- [25]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26] 耿云志. 中国近代思想通史: 第5卷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
- [27] 刘克敌. 陈寅恪与中国文化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30.
- [28] 耿云志. 中国近代思想通史: 第4卷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 327.
- [29] 杜维明. 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1册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 [31]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32] 鲁振祥. 史事追寻: 中共思想史上若干问题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 [3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年谱(1898-1949)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 [34]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 2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35]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1卷 [M]. 2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61.
- [3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传(1949-1976)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730.

责任编辑: 陈璐